

党政军部分

孙瑞符

(1916~1947)

“如果我的病根治的话，回国后好为祖国的建设服务。万一治不好，也不要紧，你就答应这里，把我的遗体献给医疗科研部门，供他们攻克癌症作科学研究之用，以解除更多的后来人的痛苦……。”这段话，是一名为了辽吉大地解放事业，耗尽自身最后一滴血的战士，临终时留给妻子的遗言。他，就是被辽吉人民誉为“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好干部、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孙瑞符同志。

一

孙瑞符，别名孙久清。1916年出生于辽宁省北镇县沟帮子镇一个破落的小商人家庭。父亲因没念过书饱尝了没文化的苦，为此想方设法供孩子读书。瑞符幼时，父亲常对他说：“中国人受外国侵略者的气，就是因为中国落后，不懂科学，我宁可借钱付‘驴打滚’的利息，也要供孩子读书，为中国人争气。”母亲是位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勤劳贤慧的农家妇女。孙瑞符在家排行老二，兄、弟、妹各一人。

他7岁上沟帮子镇扶轮小学，14岁到锦州中学读书，15

岁考入沈阳第三高中。青少年时期的孙瑞符，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常常夜阑更深还手不释卷，孜孜研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我东北领土，东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沟帮子镇大街上，人们常看到一个又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侵略者暗害、枪杀，扔在大街上、挂在门洞里的悲惨场面。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血腥屠杀，孙瑞符的父亲气得将牙咬得嘎巴生响，他不忍心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去当“亡国奴”，不得不让次子瑞符（化名孙久清）带上年幼的弟弟（化名康君健），流亡入关，奔赴北平东北学院高中部学习。毕业后升入北平大学化学系。刚到北平，家里还可以给他们寄点钱，后来因家中借债越来越多，加之日军疯狂封锁，通往关内的要道山海关把守森严，整个社会兵荒马乱，家信难以安全寄出，孙瑞符和弟弟与家中失去联系，只得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利用课余时间或晚上，走出校门，替别人教学，给人家绘图，借以换来微薄的收入，维持弟弟与自己学习。

此时，久别断绝书信往来的父母，由于积债如山，日子过的越来越贫困。加之，沟帮子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家里买的荒地被迫被日军强行霸占，家里的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无奈，父亲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去要那块被霸占了的土地。结果不出所料，阴险的敌人，采用先付给钱，然后再将人致死的卑鄙手段，毒死了孙瑞符的父亲。就连为了掩盖他们惨无人道、杀人灭口而支付的那么几个少得可怜的钱，瑞符的母亲还没有拿到家里，半路就被债主们抢劫一空，并以“无法还债”为名，抄了他们家。这位年逾五旬，体弱多病的孙瑞符的母亲，在沟帮子镇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只好带上年幼的

女儿孙匀，投奔到锦县薛家屯的姨母家避难。生离死别的痛苦，导致他母亲的病越来越重，因无钱医治，病魔缠身，不幸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垮台的前一年，含恨逝世。

二

1935年秋，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创建。这时，正在北平大学化学系学习深造的孙瑞符，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并担任北平市民先总队部交通总队长兼出版部秘书。他亲自组织领导先锋队员，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救亡传单，创办民先进步报刊，宣传民主、抗战的革命思想。他还亲自到北平的兄弟院校，吸收发展新的民先队员，演讲、动员，号召青年学生，要自觉地武装行动起来，投身到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伟大洪流之中。直到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他才和弟弟一起随“民先”领导的“平津流亡学生会”去南京，后转赴武汉、西安等地，继续开展抗日救亡的组织宣传活动。

1938年2月，日军大举进攻我山西临汾地区，因形势的变化，孙瑞符被调往我党领导下的山西“牺盟会”（牺牲救国同盟会），曾任曲沃、冀城、夏县三个牺盟中心区的宣传部长，负责编写宣传资料和报道工作。

1939年1月，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上的需要，经“牺盟”总会批准，将冀城牺盟中心区搬至平陆涧阳镇赵家坪，改名为“夏县牺盟中心区”孙瑞符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坚持在中条山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年4月，孙瑞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负责中心区党团的组织、宣传工作，主办《中条战报》，宣传民主、抗战的革命

思想，并举办了夏县中心区及下属县、区干部轮训班，共培训县、区、村，工、农、青、妇、民兵等各类干部近万名。孙瑞符还利用牺盟会“合理负担”的口号，领导群众开展了小规模减租减息活动，少数地区还批斗了一同恶霸地主。

1940年初，孙瑞符被派往北方局党校第三期学习班学习，并担任学习班党支部委员和学习小组长。在学习期间，他除了自身钻研党的方针政策外，还经常将同学们召集在一起，学习革命理论，探讨当时和今后的政治形势，研究如何从事开展革命运动。他就刘少奇《党的建设中的问题》一文，写下了近万字的读书笔记。通过在党校学习，提高了他对马列主义的认识。

1940年8月，孙瑞符被分配到太行山区《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华北《新华日报》是为了指导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军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创办的，是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孙瑞符同志在该报近三年的工作时间内，先后担任编辑委员、经理部主任、秘书、代理部长，并兼任经理部党总支书记等职。在这段时间，孙瑞符同志以他出众的才华，勤于思考、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刻苦好学、博览强记的学习习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挥动生辉之笔致力于祖国的科普创作，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反动军阀的愚昧统治，宣传民主科学的革命思想，特别是为华北地区早年的科学普及事业做出了贡献，给同事们及太行山区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孙瑞符到报社不久，发现山区百姓封建迷信思想较重，将一切不吉利的事统统归于“老天”、“土地爷”等。针对这种情况，他充分利用自己学过的知识，系统地写出知识

性、科学性、资料性较强的文章，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如“谈天”、“说地”、“为什么打雷”、“下雨怎么回事”，都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这一行动在群众中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

1941年8月，金秋时节，在新华日报社，在向云的主持下，孙瑞符与分别了两年的在太行山区四分区妇救会工作的女朋友张彩结了婚。这对年轻的夫妇，在六个春秋的生活中，没有建立一个固定的家庭，也没有要小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尽力地多贡献一份自己力量。孙瑞符常对爱人说：“周总理、邓大姐，他们为革命都宁可不要孩子，更何况我们呢……！”直到他去世前夕，还对爱人说：“我们没有孩子，没给你留下麻烦，你要很好地为党工作……。”

1942年5月下旬，日伪调集大批人马“扫荡”太行山根据地。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孙瑞符积极组织经理部人员转移，保护印刷机器，营救受伤的同志，掩埋战友的尸体，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撤销，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成立，《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华北《新华日报》的部分同志被调往延安。

1943年末，赴延安的同志，在高戈、孙瑞符的带领下，经太行，过卧龙滩，闯平饶，攀晋西北大山，最后渡黄河，一路上顶风雪、冒严寒，冲过敌人一道道阻截，历尽千辛万苦，于1944年3月到达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孙瑞符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六部学习，任第二十党支部（后改为四支部）支委。他参加了延安第二期整风

运动、大生产运动。先后两次聆听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讲话，内心受到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在延安期间，孙瑞符负责的那个学习小组，在我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指导下，他亲自动手，带动全组的同志，种粮、种菜、纺线。据老同志讲，瑞符纺的线，既快质量又好。1944年秋，他参观了南泥湾成果展览，受到很大启发。回来后，他根据自己小组本身的特点，搞手工商品生产。在他的设计指挥下，生产出的“丰足牌牙粉”、“丰足牌化学墨水”，不仅解决了内部供应不足，同时也补充了市场的供应，多次受到领导的好评。

1945年9月2日，在我党“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英明决策下，孙瑞符奉命辞别革命圣地——延安，与爱人张彩，随“东北干部团”，昼夜兼程，徒步周东北进发。他们途经陕北、晋绥、晋察冀、冀热辽等抗日根据地，中途常有国民党和日伪军的阻截、袭击，“东干团”为争取时间尽快到达东北，几经改变行军路线，绕过古北口，穿过“无人区”，历经两个多月，于同年11月12日到达锦州。

三

1945年11月15日，辽西地委派孙瑞符为北镇县工委书记，随同来的有孟卓（马希融）及孙的爱人张彩。抵达北镇县城后，即与县长邵自睿研究了工作，于同月19日，在他的组织下，召开了首届中共北镇县工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委员和分工，孙瑞符任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委员有邵自睿（县长兼县支队长）、孟卓（县大队副政委）、张彩

（民运部长）、赵文隆（六十六团团长）。会上研究了当时的主要工作。工委还决定立即建立党的基层支部，孙瑞符兼任工委党支部书记。支部还对党员布置了物色培养对象，积极发展新党员的任务。为了解决县、区党政机构人员不足问题，工委决定：就地物色一批基层骨干，于同年12月上旬先后举办了两期以贫苦知识分子为主的军政干部训练班，每期约二三十人，学习期满，全部安排到县直各部门及区政府工作，充分调动了本地区人发挥作用的积极性。

被日军奴役了长达14年之久的东北人民，还存在着一些所谓的“正统”观念，他们把中国将来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据此，孙瑞符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接近革命群众，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介绍陕北人民及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情况，热心扶植、培养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

孙瑞符还亲自动员城内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县城内街、巷刷写革命标语、口号，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的宗旨和政治主张。如：坚决贯彻“双十协定”、“停止内战”、“反对一党专权”、“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团结起来”等，其中孙瑞符的爱人张彩当时在城内鼓楼前面大墙上涂写的“为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幸福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醒目大字，直到1948年初，第二次收复北镇，字迹仍清晰存在。

孙瑞符忙于工作，于11月到北镇路经沟帮子车站，都来不及回本屯看望亲人，仅从一个同乡邻居处得知他的父亲早已被日本侵略军活活逼死，母亲也忧郁而死，只剩下个孤零零的妹妹被乡下三姨妈抚养。他不顾这些，化悲痛为力量，

立即赶到县城，夜以继日地工作。当小妹孙匀听到哥哥回来的音讯，特意从姨妈家跑来看望二哥二嫂的时候，兄妹相见，悲喜交加，妹妹含泪向哥哥述说父母的不幸：“你们走后，妈妈整夜坐在豆腐块大的玻璃窗前，盼望自己的孩子早一天回来，临终时还叫你们的名字，死后，因为没看上你们一眼，双眼都没闭上……”听着妹妹带责备的述说，孙瑞符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对妹妹说：“你三哥（孙瑞森，别名康君健）在太行山区，在参加掩护我军主力前进，为保护我北方局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几千名同志的转移时负了重伤，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滴血洒在太行山上。”说到这里，孙瑞符强忍悲痛，帮助妹妹擦干泪水，并安慰地说：“革命嘛，就要有牺牲，只有少数人的牺牲，才能使多数人得到生存和幸福，我们要振奋起来。你长大了，也要参加革命，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1945年12月初，新民地委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期间，北镇县工委于12月24日撤出北镇县城后到阜新的馒头沟。12月28日会议结束后，为了尽快传达会议精神，孙瑞符只身从新民绕道阜新找到北镇县工委机关，火速传达东北局、辽西省委的指示，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犯，我东北靠铁路沿线的部分城市已失守，决定：辽西地区分别划归阜新地委和北（北票）、阜（阜新）、义（义县）联合工委领导，北镇、黑山两县干部应立即向阜新地委靠拢，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同月30日，北镇县委、政府全体人员撤抵阜新，坚持在阜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阜新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孙瑞符领导县工委、县政府干部，一方面开始着手发动群众反奸清算，组织农会 and 自卫队；一方面为我主力部队筹

集粮草，动员赶制军服军鞋等。1946年2月中旬，北镇工委及所属全体干部，按上级命令，指定在阜、彰边界的野马套海一带，全力支援秀水河子战役，动员大车、民工、担架、粮草等事宜，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赢得了秀水河子战斗的胜利。

四

1946年2月末，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我解放区，疯狂抢占我东北铁路沿线城镇。为了贯彻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我军避敌主力，转移后方。孙瑞符根据上级的指示，与赵文龙、徐鹤京、邵自睿、张日新、张彩被分配到哲里木盟开鲁县，孙瑞符任开鲁县委副书记。这时他已身患癌症，剧烈的病痛时时向他袭来，但是他还是咬紧牙关，为建设好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早日解放重陷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亲人，仍然坚持走乡串户，领导开鲁县人民除奸、反霸、打土匪、搞减租减息，抓春耕生产，组建城乡人民政权工作。

1946年7月，组织上调他到科尔沁左翼后旗任副旗长，他欣然受命，立即到职工作。这时他的睾丸出现肿瘤，伴有阵痛，影响坐立和行动，而他仍然忍着病痛，照常参加工作并主持会议，认真负责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地委布置的各项任务。8月份因为劳累过度，病情加重，正值延安中央医院部分医务人员赴齐齐哈尔经开鲁县城。哲盟地委闻讯，特地通知他立即赶回开鲁治疗。手术未及两个月，刀口刚见愈合，他再次接任开鲁县委副书记职务，一半工作，一半休养。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向开鲁进犯，开鲁县委随即主

动作了转移，他也随县委一班人等一起撤离县城，决心坚持在开鲁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地委书记吕明仁知道后，亲自指示县委和他本人，要立即随军分区和地委后方机关人员，暂时去西科中旗高力板休息。

1947年初，他的健康刚有好转，吕明仁同志率“长江骑兵团”准备南下，重新收复被国民党反动派占去的通辽、开鲁。他闻讯后，连夜给组织写信，申请参加南下武工队行列，得到批准后，他心中万分高兴，夜不成寐，挥笔疾书，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希望去掉每个人心头的大病，自己能参加这个行列也算是幸事，但要完成任务才不负此行……。”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的确，希望是最宝贵的东西，人们生活中如果没有了希望，那就太荒凉了，比如我自己吧，来时希望一个胜利！回去希望带回这个胜利，给那些希望着我们的人们……。”广阔的科尔沁草原，寒流、风雪、飞沙……艰苦的战斗生活，没有使这位身患重病的战士屈服。他艰难地跋涉着，以惊人的毅力默默地实现着自己的诺言：“带回这个胜利，给那些希望着我们的人们……。”

1947年3月，我军收复通辽、开鲁两个县城后，孙瑞符调到哲里木盟工委任宣传部长兼东科旗委书记，由于随军南下的工作过度劳累，使他旧病复发，腰部开始酸痛并出现碗口大的肿瘤，但他仍不愿脱离工作休养。5月初，党组织鉴于他身体日渐消瘦，腰部肿瘤也在迅速增大，强令他去洮南疗养院休养。当时群医棘手，无奈转至哈尔滨陆军总院，经院方邀请哈市各名医会诊，确诊为“肾癌晚期”。限于国内医疗条件，院方表示已无法救治，并热情地向孙瑞符推荐了

许多外文版医学杂志，说明癌症是当今世界上四大不治之症之一，目前唯有苏、美两国尚能早期防治。面对病魔和死神的威胁，孙瑞符无所畏惧，他如实冷静客观地向辽吉省委写了详细的书面汇报，表明了自己愿在生命的有限时间内重回哲盟工作，决不在病床上消磨时光，同时他强忍病痛，在哈市各处奔走求医，从不悲观。他在病床上读完《目击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本书后，在读书笔记上写道：“……是的，人们就应该这样活着或死去，要爱就爱，要恨就恨，一切都应有强烈的伟大目的，这就是生与死的力量所在……”他并对医护人员说：“同样的病，长在不同质的人身上，就应该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只要还有一线光明，就应该去努力争取。”东北局、辽吉省委十分关心他的病情。辽吉省委书记陶铸1947年6月4日给他写了回信，信中关心地写道：“近因辽吉形势大发展，省委及各地同志因之较忙，致未常写信给你，望能见谅。我们同意你去苏联医病，省委将另发电报请示东北局为你设法赴苏。”7月初，在上级党组织的关怀下，由其爱人张彩陪护，于当月12日顺利到达莫斯科，当即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此时，孙瑞符腰腹部已肿胀如孕妇六个月的形状，尽管刀割般的疼痛和不间断的呕吐，他仍然坚持按时进食、服药，从不呻吟一声；他并且能清楚地用英语与医生交谈，讲述病情变化和自我感觉，积极配合治疗，要求院方尽早予以根治。当他得知医生已决定给他进行一段放射线镭锭照射之后，将立即进行手术摘除，非常高兴。王稼祥也十分关心他的病情，特意赶来，通过张彩了解病情，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他对爱人张彩说：“我们来到莫斯科，很不容易，你要抓紧时间，好好学

习俄文，如果我的病情根治的话，出院后，我们可以请王稼祥转请党组织，允许我俩在此留学，你学纺织，我学钢铁管理，或仍去化学系深造，回国后为祖国建设服务。”接着，他还说：“万一治不好，也不要紧，你就答应把我的遗体献给医疗科研部门，供他们为攻克癌症作科学研究之用，以解除更多的后来人的痛苦……。”谁知这些话竟成了孙瑞符临终的遗言，病魔终于在1947年7月28日上午10时许，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夺去了他的生命，时年仅31岁。

孙瑞符逝世后，爱人张彩遵照他的遗嘱，将其遗体有病的部位献给了莫斯科的医疗科研部门予以解剖，然后将尸体火化。经请示王稼祥同意，将骨灰带回国内。1947年9月间交给了辽吉省委，1948年9月，省委特批准将孙瑞符的骨灰匣安放在今吉林省白城子烈士陵园，筑有高两米左右的纪念碑。正面刻有“孙瑞符同志精神不死”，背面刻有他的“传略”。

碑文中说：“孙瑞符同志性格刚毅，生活朴素，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积极主动，井井有条，而最大的特点还在于他有丰富的思考能力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孙瑞符同志虽死，“但其毕生的精力贡献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功绩与优良作风，将永垂不朽！”

（县委党史办供稿）

王 企

王企（1920—1989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滨县的农民之家。幼年家贫，从十七岁开始做长工，扛交行，过着饥寒交

迫的生活。1945年家乡解放，于同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8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农会主任、区委书记兼区长；1949年随军南下，到达江西省永新县，先后任中共拿山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永新县县长、县委书记、吉安地委农工部长等职；1959年5月调回东北到北镇任县委书记。1964年调锦州市任林业局长。离休后于1989年因病故于锦州，享年69岁。

王企在北镇工作五年多的时间里，正值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在那特定的艰苦年代和特殊的工作环境里，他闪耀出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带领全县人民战胜灾荒，渡过难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心装全县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工作深入实际，善于调查研究的群众路线作风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革命传统，在北镇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下边记述整理的仅是他在北镇工作期间的几个片断。

与民同苦心心相印

1959年秋，北镇城乡人民同全国一样，生产、生活进入暂时困难时期。王企就在这样条件下，奉命从关内携着家眷来东北任中共北镇县委书记。1960年春，农村困难程度更为严峻了。口粮从一天五两减到三两，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身为县委的主要领导者，面对如此情况他深知任务的艰巨性。他当时想到应做好两件事：一是带好县级班子；二是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于是他深入农村接触农民群众，走访社级班子，很快掌握了全县的基本状况和干群思想动向。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他坚定的提出：“战胜当前暂时困难

的最重要因素是保护好人的积极性。其关键又在于我们领导者和广大干部要在群众中体现与民心相印，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恢复生产，度过难关”的意见。得到了县委常委们的赞同。随之制定了县里下乡干部一律吃派饭，群众吃啥干部吃啥。同时要做到五不吃，即大米、白面、鱼、肉、蛋；下乡干部工作在那里，就在那里参加劳动；自带劳动手册，同农民一样评工；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任何人不准违犯纪律。从此，组织干部下乡，与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团结一致，开展生产自救，度过难关的群众运动在城乡普遍展开。

王企率先垂范，执行纪律一丝不苟。一次到鲍家公社检查工作需要在公社食堂吃饭，随同他下乡的秘书一再嘱咐公社党委书记：“做玉米饼子和豆腐汤就可以，搞别的他不但不吃还得批评你”。可这位好心的公社书记没有这么办，他认为，王书记来北镇后第一次到鲍家吃饭，身体又不好，煎几个鸡蛋总算可以吧？可是，土企进食堂就不满意了，看放在桌上的一盘黄瓜芽、一盘炒鸡蛋就对秘书说：“你没当他们说吗？”“当我说了”党委书记接过话茬说：“我想在公社食堂吃盘炒鸡蛋算啥特殊，王书记吃吧下不为例”。王企心情沉重的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当前是困难时期，农民的生活太苦了，如果我们吃饭不想到农民，还算什么共产党员？”王企只吃了大饼子和黄瓜菜。经常随他下乡的干部说这样的事是时有发生。

1960年初夏，由于农村口粮标准低，又吃食堂做的蒸量饭，人吃不饱，干活没劲，夏锄生产得不到很好开展，因而田间草荒普遍发生。草不灭、苗不长，严重影响秋后产量。

这时的王企是夜不能寝，食不甘味。既要运筹全县灭荒良策，又要坚持同群众战斗在灭荒的第一线。有一次在赵屯公社大吴屯大队参加灭草荒。食堂吃的是高粮面加淀粉蒸量饼子，身患严重胃病的王企书记吃完就吐了。人们劝他回县休息几天。他说：“现在全县草荒这么严重，我回机关能呆得住吗？”由于胃病的影响，每天吃不多少东西，加上工作过累，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了。一天上午，大队党支部书记李英华在田间锄草时，看到王企犯了胃病，不断呕吐，晌午回家煮了五个鸡蛋。下午在地头向王企说：“王书记，我向你请示个事儿，你可别批评我啊”。王企一听就笑了。李英华从兜里拿出鸡蛋恳求地说：“我看你上午吃点东西全吐了，我在家煮了几个鸡蛋你吃了吧。”王企看这位基层党支部书记热情而诚意地关心他，感动地说：“英华啊，你的心情我是知道的，但是咱们现正处在极端困难的时候，你让我吃鸡蛋怎能咽得下呢？等咱们把草荒灭了，让小苗茁壮地长起来，秋后得个丰收，那时候再吃不行吗？”这一席话说得李英华哭了。

拉拉屯是从盘山县划归北镇所属不久的村子，这是盘北交界的涝洼地带，全村仅几十户人家，生活极为困难。王企与县长刘治臣赶到这个村逐户登门拜访，看到群众把地里的野菜都吃光了，有的人家甚至把枕头里的谷瘪子都吃了，面对着生命垂危的群众，他眼含泪水，心里十分难过。当走进一个五保户家里，看到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呻吟在炕上，王企坐在老人身旁问想吃点什么？老人叹气地说，“唉，我要能吃一顿猪肉就行了。”他当即派人回县城食品公司买来二斤猪肉。为了及时解救拉拉屯群众的生活危机，从县里调

来一汽车豆饼，几桶豆油，糠麸饼和食品公司淹制的咸白菜等救急食品；还派来了医疗队，抢救病人，这里的群众得救了。人们为表达感激之情准备给书记、县长做顿小米饭；可他们说什么也不吃，还是和群众一样吃的野菜团。群众眼含热泪说：“这是多么好的书记，多么好的县长啊”。

在那个特殊年代，那艰苦的岁月里，要种好地、保护好人这平常的任务又是多么的艰巨。王企就是凭着坚强的使命感和与民同甘共苦的革命情怀，踏实求真的作风，换来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工作求实 不讲空话

王企在北镇主持县委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农村，很少在机关，有些常委会议和看文件多在晚间进行。

当时县委机关仅有一台小吉普汽车。但他下乡检查工作从不坐车，有时骑自行车，在春夏两季检查苗情时又多是步行，哪一天都要走几十里的路程。他步行不是走公社串大队听汇报，而是下田间看“结合部”（社与社、队与队的交界地段）发现问题留下人落实帮助解决。所以有时跟他的几位工作人员到最后仅剩他一个人回县城。

在指导工作上，他善于运用典型经验和亲自调查来的第一手资料加以研究整理，再通过会议讨论形成结论性意见，推动面上的工作。从不开没有准备没有结论的会议。典型的地区有下肖、小李屯、王家、曹屯、贺屯、大吴屯等村。这是他分山平洼三种地型的“试验田”。经常到这些地方边劳动边工作。摸索指导全县各项工作的路子。在当时主要是总

结“度荒”经验。1962年春旱，在下肖村拜访了一位多年坚持记录天气的老农民，从中获得了很多抗旱的方法。他马上向全县提出了强有力抗旱措施。有一次锦州市委召开灭草荒会议，为更好的贯彻会议精神，散会时往县里打电话让派名办公室干部到沟帮子车站等他，以便下火车直接到农村调查研究。下火车已是午后三点多钟了，他们沿着返县两侧的地块走。走到赖公堡子大队时天已黑了。为了在第二天的县委常委会上结合县的实际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在赖公堡大队吃过派饭后还要连夜往回赶路。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奎借了两台自行车，因天黑当骑到河沙地时，王企从车上摔下来碰伤了腿，只好推着车子走。回到县城已是夜间十点多钟了。这是王企开会前的一贯作法。每次会议前都要亲自调查研究，有时给办公室工作人员出题目限期作出回答，就是靠这些实际情况贯彻好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王企在北镇工作期间，结识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朋友。他在群众中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身着半旧布衣、脚穿便鞋走到那里，就同那里的党员干部和老农坐在一起，手卷着旱烟，互相谈唠起来。有些干部和老农的意见，他用本子记录下来，有时向老农讲述党对农村政策和县里的中心工作。由于经常深入农村，对全县的情况非常清楚。有时干部们回报工作如有不实之处，总要追根问底。他经常告诫干部：“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对工作情况要求实，对上级回报要讲真话，情况不实工作会出现失误，对上对下说谎话讲空话既欺骗上级又危害群众”。

1961年夏季，一场暴雨成灾，西沙河发大水淹没不少庄稼。闻讯后心急如焚，他不满足电话的回报，为了弄清受灾